

## 闽南方言“肉”义词的分布与演变

曾智超

南开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 以广义闽南方言(莆仙、泉漳、大田、潮汕、雷州、琼文)的肉义词为研究对象,在地理分布的基础上,通过代际差异、语义及构词变异、早期移民方言和历史文献等考察其演变史。“脉”(如[baʔ<sup>7</sup>])“肉 h-”“肉 n-”分别是漳州、泉州、莆仙的早期共同形式,清代以来泉州方言发生了“脉”的扩张,潮汕方言则发生了“脉”的淘汰。大方言区有推平变异的趋势,如台湾、雷州和琼文;而部分小方言岛保持或增加了变异。还讨论了音节内混成形式的分布和产生过程。

### 一、背景

“肉”义词是闽南方言中少数有词汇差异的核心词之一。以泉漳小片为例,Swadesh (1971:283) 100 核心词表,可能只有 5 项存在词汇变异,分别是 flesh、give (度、还、传、乞等,见吕晓玲 2016)、green (绿或青)、say (讲、说或坦)和 who (啥依、底依、谁等)。本文即以肉义词为研究对象。

泉漳小片以及大田、尤溪、潮州、汕头、揭阳单点材料来自笔者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3 月的调查。其余来源为:海南(梁猷刚 1986;刘新中 2004;杜依倩 2007),台湾(张屏生 2017),莆田(李如龙等 2019),龙岩(张振兴 1984;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2;Branner 1999),尤溪(李如龙、张其兴 2015),诏安(张以文 2017),以上均包括省/市/县辖区内的多个点;以及,泉州(林连通 1993),安溪安美(曾南逸 2013),漳州(陈正统 2007),潮阳(张盛裕 1981),澄海(林伦伦 1996),南澳后宅、云澳(林伦伦、林春雨 2007),海丰(罗志海 2009),陆丰(陈筱琪 2008),汕尾(高洵 2010),茂名鳌头、袂花(刘媛媛 2017),电白(戴由武、戴汉辉 1994),云浮罗定、吴川兰石(陈云龙 2012),遂溪(Yue-Hashimoto 1985),雷州(林伦伦 2006),徐闻下洋(陈云龙、蔡蓝 2005),乐昌塔头坝、英德鱼咀、郁南连滩、平乐周塘(蔡玄晖 2009),苍南灵溪(温端政 1991),温州洞头(曾蓉蓉 2008),赣县安平(宋婕妤 2015),玉山紫湖(丁月香 2017),广丰铜山(胡松柏 1998)。其余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的来源随文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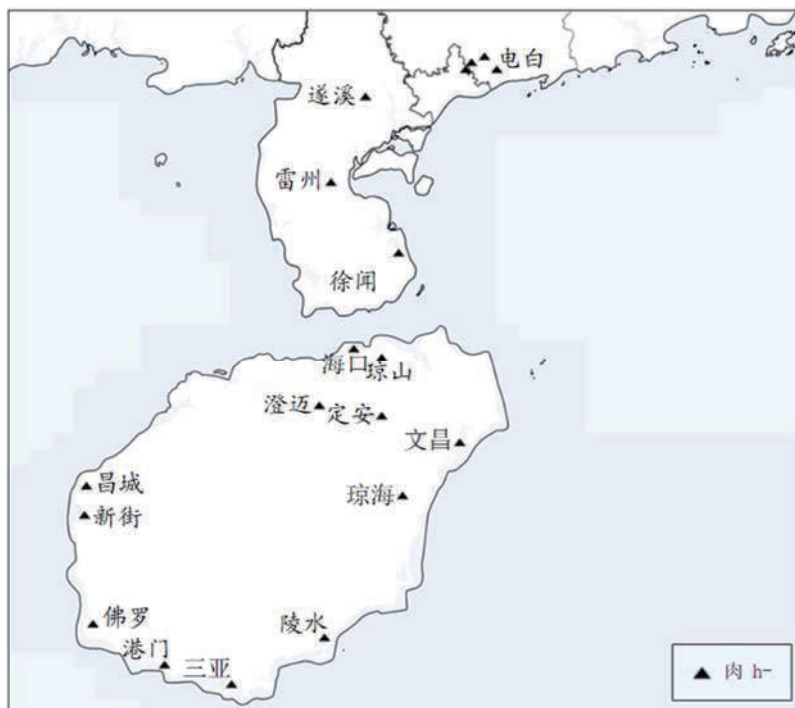
### 二、“肉”义词的三类形式及地理分布

陈保亚、汪锋(2006)提出,核心语素应当满足“构词能力强、稳定程度高”等要求,因此即便一个方言在某义项上有词汇变异,也能根据上述标准择取一个词或语素作为代表形式,本文称这个最无标的形式为“第一形式”。各地肉义词的第一形式,如图 1



(a, b) 所示<sup>1</sup>。

图 1 (a, b): 闽南方言“肉”义词第一形式的地理分布



<sup>1</sup> 图 1 说明：地名宋体表示市，楷体为县或乡镇。除闽南方言外，也绘制若干周边方言。

## 2.1 脈

闽南方言“肉”义词有两个词源，一个是“肉”字，另一个是  $baʔ^7$ 、 $māʔ^7$  等，后者本字不明，本文记为“脈”。泉漳小片的厦门、漳州、龙岩地区、泉州内陆山区以及台湾都说“脈”，北部内陆的大田小片也说“脈”；西部龙岩市内的闽客混合方言，如万安，以及北部三明尤溪县境内多种具有闽东、闽南、闽中和闽北过渡性质的方言，也说“脈”。粤东闽语潮汕小片的主流说“肉”，但东边的南澳岛云澳镇及西侧的陆丰、汕尾说“脈”。粤西和海南闽语都不说“脈”。

(1)	厦门	漳州	龙岩	台北	陆丰
	脈	$baʔ^7$	$baʔ^7$	$ba^6$	$baʔ^7$

“脈”的词形如(1)所示。共同闽南语喉塞韵尾在龙岩脱落，原喉塞韵尾阴入调大部分派入阳去，故各地符合语音对应，早期形式为  $*baʔ^7$ 。该形式不合“肉”字的音变规律，一般认为是“肉”字的训读音(如，陈章太、李如龙 1991:137;《汉语方音字汇》2003:211)。黄典诚(1985)考其本字为“脉”，但梗摄开口二等入声即麦、陌韵泉漳白读为  $eʔ\sim\varepsilonʔ$ ，仅有“拍”“百”(泉厦)读为  $aʔ$ ；语义上“脉”的本义是血管，文献也未见指肉用例，可能不是本字。赵加(1991)考“脈”为古壮语底层词，但壮语南部方言的  $*ʔba:i^5$  更早的语义是“祭祀用的肉块”甚或动词“割(肉)”(鄢卓 2021)，恐难对应。邓晓华(1994)考其为古南岛语底层词，但所举各语言中的词本身是否同源尚且成疑。如水语  $man^2$ {油}<sup>2</sup>和黎语  $mam^2$ {肉}，前者原始侗台语拟为  $*mən^2$ {荤油}，黎语缺失该词(梁敏、张均如 1996:572)，后者原始黎语拟为  $*rəmʔ$ (Norquest 2007:542)，两词似不同源。故本文仍以未知其词源为前提。

## 2.2 肉(h-)

另一个词源是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同源的“肉”字，可根据声母的不同划分为两类，一类为 h-声母，另一类为 n-声母。h-词形作为第一形式分布在彼此远隔的泉州沿海和粤西、海南。在泉州沿海地区主要分布于市区(鲤城区等)、晋江、石狮及北部边缘的泉港。在粤西闽语雷州片和海南的琼文闽语各片，则是集中大片分布，且没有另两种形式。

(2)	泉州	同安	雷州	海口	三亚
	肉	$hiak^8$	$hik^8$	$hip^8$	$hiok^8$

(3)  $[+consonantal, +nasal] > h / \_[-consonantal, +high]$

(4)	泉州	厦门	漳州	汕头	雷州	海口	莆田
鱼疑	$huu^2$	$hi^2$	$hi^2$	$huu^2$	$hu^2$	$hu^2$	$hy^2$
耳日	$hi^4$	$hi^6$	$hi^6$	$hi^4$	$hi^2$	$hi^6$	$hi^6$
箸日	$hioʔ^8$	$hioʔ^8$	$hioʔ^8$	$hioʔ^8$	$hiʔ^5$	$hio^6$	$niau^2$

“肉”的声母读 h-系中古鼻音声母字在高元音前去鼻化的音变所致(张光宇 1989)，

<sup>2</sup> {}表示语义，下同。

可写为规则(3)。如(4)所示,“鱼”“耳”“箸{叶子}”等核心词在闽南各片均发生这个音变,这是早期的共同创新。<sup>3</sup>泉漳日母白读除h-外,另有/n-/[n~l]的形式,如“若”泉 na<sup>4</sup>、厦漳 na<sup>6</sup>、“闰” lun<sup>6</sup>等,且无元音条件。我们认为h-和/n-/处在同一历史层次,h-是\*n-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肉 h-”和下文的“肉 n-”实际上是同一词源、同一层次的形式,区别为是否发生(3)的扩散式音变。

琼文闽语还有读为零声母的形式,概由“肉 h-”音变而来。在海口,泉漳的\*t<sup>h</sup>- (透母为主)擦化,与\*h- (晓匣母及(4)所列字等)合流为h-; \*k<sup>h</sup>- (溪母为主)擦化为x-。在文昌,则是\*t<sup>h</sup>和\*k<sup>h</sup>擦化并合流为x-, \*h-变为h- (辛世彪 2013:39ff),本文依梁猷刚(1986)将h-作/h-/。万宁(中嶋幹起 2002)的演变与文昌相同,但“肉”例外地读为[iok<sup>8</sup>],大概是零星地发生了h-的脱落。刘新中(2004:106)还记录了若干“肉”读零声母的方言点。包括万宁在内,这些点均未绘入图1b,但很可能都由“肉 h-”演变而来。

### 2.3 肉(n-)

“肉 n-”的声母未发生音变(3),声调阳入,如(5)所示。它作为第一形式分布在潮汕大部及整个莆仙方言,呈远隔分布。闽东、闽北方言肉的声母也都是n-,图1a画出了福州、尤溪洋中两个闽东方言的ny<sup>?</sup><sup>8</sup>。

(5)	莆田	仙游	枫亭	汕头	潮阳
肉	nœ <sup>?</sup> <sup>8</sup>	ny <sup>?</sup> <sup>8</sup>	ni <sup>?</sup> <sup>8</sup>	nek <sup>8</sup>	nek <sup>8</sup>

“肉 h/n-”的韵母,方言间有层次差别。其中泉州、同安、雷州、潮汕的形式属于同一历史层次。通摄三等在泉腔韵书《汇音妙悟》(1800)中归卿韵,早期泉州可拟为\*iəŋ/iək (曾南逸 2013);其入声韵主元音在鲤城等地低化为iak,阳声韵仍保持iəŋ。同安等地则是阳声韵、入声韵一道脱落主元音,或者说高化为iŋ/ik。漳州方言早期形式可依云霄话拟为\*eŋ/ek,这与今潮汕音值相同,芎城等地高化为iŋ/ik,但漳州不说“肉 h/n-”。雷州hip<sup>7</sup>的韵尾特别,雷州有几个常用字发生了ik>ip的词汇扩散式音变,又如“竹”tip<sup>7</sup>、“叔”tsip<sup>7</sup>。

莆仙三个点的韵母不易判断层次。如(6)所示,“肉、熟、叔”三字福州<sup>4</sup>、原始宁德(秋谷裕幸 2018)和原始泉州(曾南逸 2013)都同韵,莆田也同韵,但仙游和枫亭“肉”与“熟、叔”不同韵,是音韵例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箸”字,莆仙的“箸”未同闽南一起发生擦音化,它的韵母在仙游和枫亭也是例外,与“席{草席}、尺”等字不符。

<sup>3</sup> 音变(3)的语音条件清楚,但从现代方言看不是符合条件的词一概变。一方面它很可能以词汇扩散方式进行,另一方面晚期层次的叠置也会造成不规则,如“日”(漳州 dzit<sup>8</sup>)就没有早期层次的读音。另一种观点是给这些词构拟一套清鼻音,如Kwok(2018:37)构拟共同闽南语“肉”为\*nhuok<sup>8</sup>。

<sup>4</sup> 福州话y和øy是以声调为条件的韵母变体。

(6)	莆田	仙游	枫亭	福州	宁德	泉州
肉	nœʔ <sup>8</sup>	nyʔ <sup>8</sup>	niʔ <sup>8</sup>	nyʔ <sup>8</sup>	*nyk <sup>8</sup>	*hiək <sup>8</sup>
熟	ʎœʔ <sup>8</sup>	ʎyøʔ <sup>8</sup>	ʎieʔ <sup>8</sup>	syʔ <sup>8</sup>	*θyk <sup>8</sup>	*siək <sup>8</sup>
叔	tsœʔ <sup>7</sup>	tsyøʔ <sup>7</sup>	tsieʔ <sup>7</sup>	tsøyʔ <sup>7</sup>	*tsyk <sup>7</sup>	*tsiək <sup>7</sup>
箸	niau <sup>2</sup>	niu <sup>2</sup>	niu <sup>2</sup>	nuoʔ <sup>8</sup>	*nioʔ <sup>8</sup>	*hiøʔ <sup>8</sup>
席	ts <sup>h</sup> iau <sup>2</sup>	ts <sup>h</sup> ieu <sup>2</sup>	ts <sup>h</sup> ieu <sup>2</sup>	ts <sup>h</sup> uoʔ <sup>8</sup>	*tʃ <sup>h</sup> ioʔ <sup>8</sup>	*ts <sup>h</sup> ioʔ <sup>8</sup>
尺	ts <sup>h</sup> iau <sup>6</sup>	ts <sup>h</sup> ieu <sup>6</sup>	ts <sup>h</sup> ieu <sup>6</sup>	ts <sup>h</sup> uoʔ <sup>7</sup>	*tʃ <sup>h</sup> ioʔ <sup>7</sup>	*ts <sup>h</sup> ioʔ <sup>7</sup>

考虑到核心词的保守性，这里暂且将莆仙与其他沿海闽语“肉”的韵母视为系统对应，这样沿海闽语“肉”的韵母即属此韵类：闽东<sup>5</sup>\*yk：莆仙 œʔ~yʔ~iʔ：泉州\*iək：(漳州\*ek)：潮汕\*ek。Norman (1981:66) 构拟该韵的原始闽语为\*yk，词例“竹”。

海口、三亚等琼文闽语的韵母则是另一层次。通摄三等入声非唇音泉漳还有文读-iək。海口大部分字则失去了这套异读，不同字有不同的层次竞争结果：如“肉、竹”等字读为文读层的-iək；“绿、熟、浴”等字读为白读层的-iək，同泉州；“叔”读-ip，同雷州。这样的层次竞争容易晚期各自发生<sup>6</sup>，所以我们不以韵母的层次来对变体做分类，而以特殊性更强的鼻音声母的擦化音变(3)来分类。

上述三类形式之外，尤溪西洋、中仙的第一形式为“肉”和“豚”的混成形式，见5.2。若干方言点存在代际词汇差异，最突出的是泉州沿海地区。下面即考察该地区的词汇替换情形，以推知其早期形式。

### 三、泉州沿海地区“肉 h-”和“豚”的竞争史

如果只关注图 1a 中泉漳小片的分布，并且考虑到泉州沿海一带作为城市中心的地位，我们可能会认为“肉 h-”是以泉州市区为中心的创新，因为周边是大片的“豚”分布区。但放大视野，“肉 h-”保留在雷州和琼文闽语，并且其音韵形式相当古老，说是创新难以令人信服。柴田武(2018[1969]:34)提出“理解词”的地理分布对构建语言史的价值，因此，本文针对理解形式的等级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可以解释“肉”义词在泉漳小片特殊的地理分布，并证实泉州方言的“豚”基本是厦漳方言的接触所致。

#### 3.1 调查和分析方法

首先在变异集中区摸底调查，发现这些地区的“肉 h-”“豚”没有形成 flesh/meat<sup>7</sup>、肥/瘦、生/熟等语义对立。猪肉是当地最常见的牲畜肉，肉义词除了泛指食用肉类，也可特指猪肉这一下位概念(当然，猪肉也有专门的词)。因此，第二次调查以一张猪肉

<sup>5</sup> 以原始宁德代之，秋谷裕幸(2018:712)认为该文构拟的原始宁德方言与原始闽东方言相当接近。

<sup>6</sup> 其他方言有平行演变的例子，如漳平菁城通摄三等入声非唇音多读为文读层-iək(陈筱琪2019:346ff)。海丰的韵母也是文读层，见5.1。

<sup>7</sup> Leipzig-Jakarta 核心词表将 meat 和 flesh 合并为一个词项，依据是，在其统计的多数语言中，这两个概念用一个词表示(Tadmor 2009:68f)。闽南话的情况亦同。

的图片作为肉义词（单纯词）的诱导媒介，如果发音人看到猪肉图说出复合词，则再请其说出泛指各种肉的单纯词。还以图片调查了“猪肉”“肥肉”“瘦肉”“肉粽”“肉丸”“肉羹”“炸肉”8个复合词，以文字调查了“买肉”“吃肉”2个复合词。以下分析以单纯词“肉”为主。

黄河（2017）设计了一套精密的微观地理语言学调查方法，本文借鉴并据实际需要调整了调查方法。上述的第二次调查，具体步骤是：A. 展示图片/文字并提问→发音人回答一个或多个形式→B. 询问对其他形式的认可情况→C. 询问各理解形式的常用度、语义、用法等。之后根据表1对各形式进行分级。

表1：发音人反应量表

级别	1	2	3	4	5	6
自报	+	+	+	-	-	-
快速	+	+	-	+	+	-
常用	+	-	-	+	-	-

表1中，“自报”为“+”指的是发音人能在A环节自行说出该形式。“快速”为“+”指的是发音人快速认可该形式，包括在A、B两环节中：A环节中发音人可能思考一阵又说出某形式，则该形式为“-”；B环节中，若发音人快速否定某个形式，则也是“-”。“常用”根据发音人在B、C环节中对各形式常用度的评价确定，有些评价是自报的，有些是经过询问回答的。我们默认不存在“-快速，+常用”的可能。对发音人的反应进行分类必然存在模糊的界限，但笔者采用统一的标准。例如，B环节，某个形式发音人犹豫后说“好像听过”或“是外地的说法吧”等，则记为6。以此级别为据，1是第一形式，2-4为第二形式，5为非使用理解形式，6即为不理解。

运用这套方法，在泉州、漳州布点，老年层存在变异的每个调查点，每个年龄层<sup>8</sup>最少调查两人。一个地点的某形式属于哪个级别的判定标准是：若在总人数中有50%以上的人是相同的反应，则为该类；若没有任何一类有50%以上的认可度，则记为“个人差别明显”。

### 3.2 理解等级的地理分布及“肉”“豚”的新老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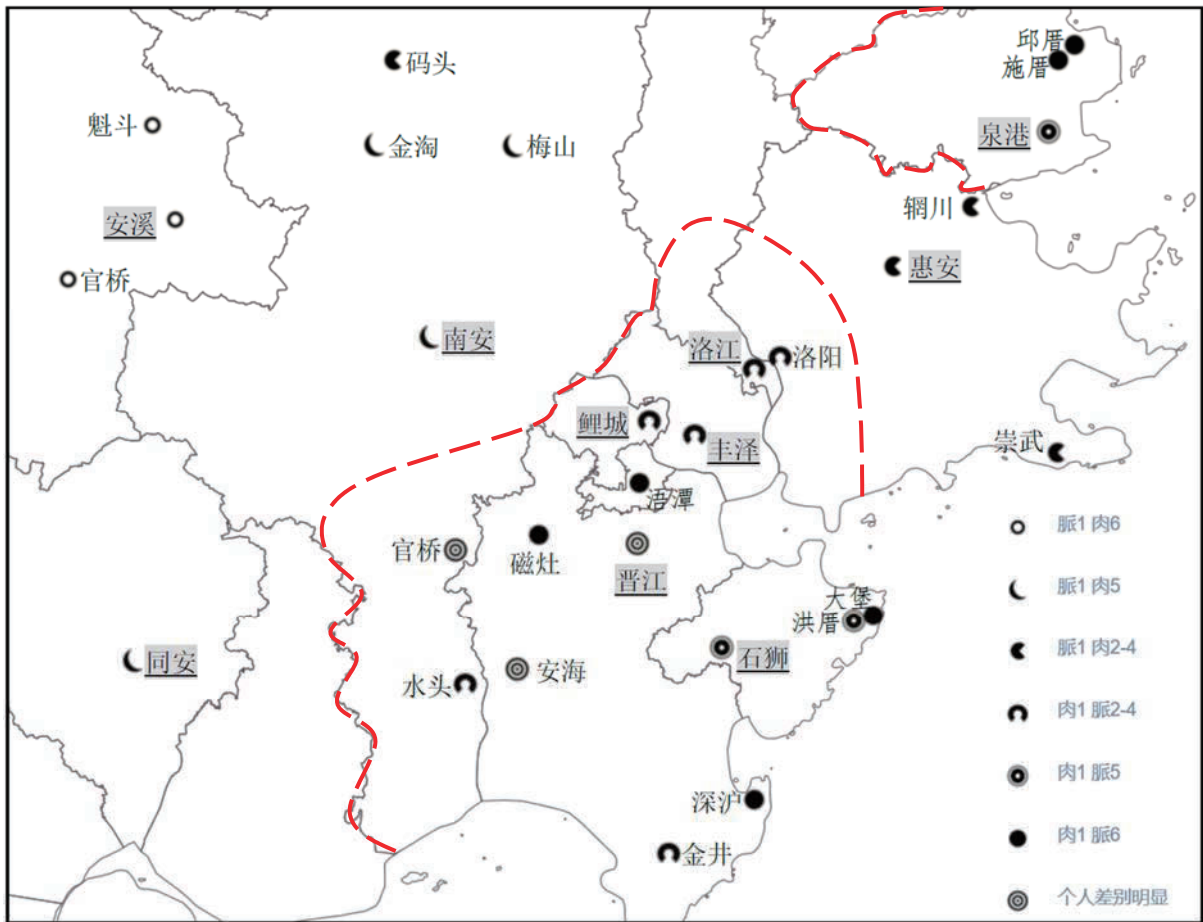
泉漳小片（不包括台湾）“肉”义词的使用和理解等级可总结如下：①泉漳小片不理解肉 n-（故3.2、3.3以“肉”指“肉 h-”）。②漳州、厦门、龙岩及三明的大田、尤溪方言，这些以“豚”为第一形式的地区；以及泉州的内陆三县，安溪、永春、德化<sup>9</sup>：都不理解“肉”。厦门同安则理解。即，“南安-同安”以西的广大闽南地区，“肉”基本对于各年龄层都不是理解形式。③总体来说，在大多数第一形式是“豚”的地点，“肉”不是理解形式，例外是泉州沿海说“豚”的南安和惠安能理解“肉”，有些还作为第二形式使用。与之相反，在第一形式是“肉”的地点，“豚”多是理解形式。“豚”不是理解形式的地点，由北到南仅有泉港邱厝、施厝村，晋江磁灶镇、池店镇浯潭村，石狮祥

<sup>8</sup> 定12-29岁为青年，30-59岁为中年，60岁及以上为老年。

<sup>9</sup> “肉 h-”作为肉义词，大多数人理解，但安溪等地“肉 h-”是语素，见4.1。

芝镇大堡村，晋江深沪镇。

图 2：泉州沿海地区老年层“肉”义词的使用及理解等级



所以，泉漳小片“肉”义词存在词汇变异的只有“南安-同安”一线以东的地区，可称为泉州沿海地区，其老年层的使用及理解形式分布见图 2<sup>10</sup>（同样存在变异的金門方言未做实地调查，没有作图）。红线内是估测的“肉 h-”作为第一形式的分布区，两个分布区也可能是相连的，但不影响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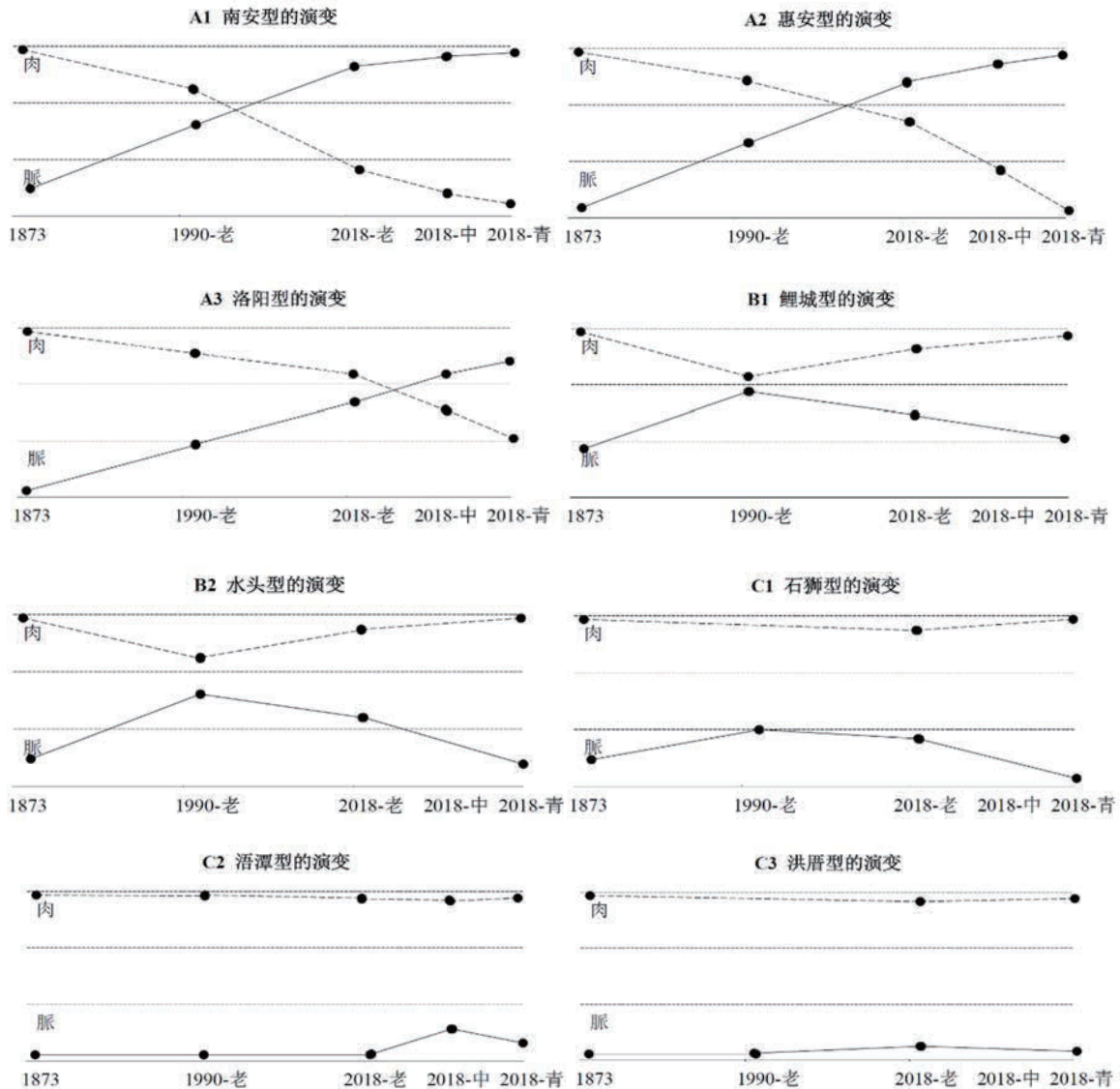
仅从老年层的分布已经可以推知“脉”是泉州沿海地区的新词，因为“脉”较弱势的地点多分布在地理上的边缘或是社会经济上的边缘（即乡村），例如，鲤城的老年层，“脉”是较常使用的第二形式，有些人还用它构成复合词：{瘦肉}“精脉”[tsiã<sup>1</sup> mā<sup>2</sup>?<sup>7</sup>]，{肥肉}“肥脉”[pui<sup>2</sup> mā<sup>2</sup>?<sup>7</sup>]（参林连通 1993:5,223）；晋江青阳街道的老年层中，有人对“脉”的反应是与“肉”并列的第一形式（1人，9.0%），有人是第二形式（5人，45.5%），有人是非使用理解形式（5人，45.5%）；然而鲤城、晋江这两大城市之间的浯潭村，老年层一致不理解“脉”。再如，泉港邱厝、祥芝、深沪位于伸入海洋的半岛，这些地点“脉”都不是理解形式；石狮的两个相距不远的村落，稍近内陆的洪厝尚能理解“脉”，临海的大堡则不理解。这是典型的边缘分布，意味着“肉”是老词，“脉”是新词。

<sup>10</sup> 图 2 说明：宋体阴影单下划线表示县（市/区），普通宋体表示乡镇，仿宋体表示村。厦门同安区古属泉州府，这里归入泉州沿海地区。图例：数字表示使用和理解的变异等级。

### 3.3 “豚”的扩张和衰退

19世纪的《厦英大词典》(Douglas 1873:327)指出 mā<sup>7</sup>在泉州“非常少用”(said quite rarely),可知“豚”在泉州沿海地区的扩散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中叶之后。以此为前提,结合调查所得的年龄层变化,下面分类描述各地从19世纪中叶至今新派的演变。A类方言“豚”成为第一形式;B类“豚”成为使用词,但近来停滞或衰退,未取代“肉”;C型“豚”的扩张更弱。图3为各类型的演变示意图<sup>11</sup>。

图3:泉州沿海地区“肉”“豚”的竞争类型



#### 3.3.1 A型:“豚”取代“肉”成为第一形式

A1. 南安型:是“豚”扩散最早的类型。从老年到青年,“肉”由非使用理解形式

<sup>11</sup> 图3说明:由下往上三条带状区域分别表示非使用理解形式(越接近横轴则越趋近不理解)、第二形式和第一形式。同一带状区域内性质基本一致,但有量的区别。横轴并非真实时间,表示的是演变趋势而非确切的时点。



降为不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脈”不变。如南安城区、梅山镇、金淘镇，厦门同安区。

南安位于泉州内陆三县与沿海地区之间。李如龙(1999:2)描述1990年代时南安老年人说“肉”，年轻人说“脈”。笔者在老年层未调查到以“肉”为第一形式的发音人，李先生记录的似乎是更老派的情况<sup>12</sup>。类似的情形是，同安的发音人自述迟至1980年代还有一些中老年人说“肉”，回忆1920年代生人曾主要说“肉”。

金门方言也属于此类，据张屏生(2007:24)，金门金沙一带发音人回忆儿时“买肉”说“拍肉”[p<sup>h</sup>a<sup>7</sup> hik<sup>8</sup>]，现已不用；且当地儿歌韵脚字出现“肉”：

(7)      kə<sup>3</sup>    bo<sup>2</sup>    sik<sup>8</sup>    qua<sup>3</sup>    bue<sup>3</sup>    hik<sup>8</sup>  
            棵      无      熟，    我      买      肉。

说明“肉”曾是主要的形式。

A2. 惠安型：“脈”的扩散仅次于南安。从老年到青年，“肉”由第二形式降为非使用理解形式或不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脈”不变。如惠安县城、辋川镇、崇武镇（西华村），南安码头镇。

以惠安县城（螺城镇）为例，“肉”仍是老年及部分中年人的使用形式。老年层中，有1人（男，80岁以上）对“肉”的反应是第一形式，14人是第二形式（其中：2级2人，3级1人，4级11人）。中年层1人为第二形式（4级），3人为理解形式，1人不理解。青年层2人为理解形式（4级），5人不理解。比例见表2：

表2：惠安各年龄层“肉”“脈”的理解等级比例

	第一形式	第二形式	非使用理解形式	不理解
老年	6.7%	93.3%	0	0
中年	0	20%	60%	20%
青年	0	0	28.6%	71.4%

由于处于“脈”不久前刚成为第一形式的阶段，因此惠安“肉”“脈”的变异十分明显。各年龄层“买肉”和“吃肉”两个词组的第一形式分别是<sup>13</sup>：

(8)            买肉                          吃肉  
            老年      p<sup>h</sup>a<sup>7</sup> ba<sup>7</sup> 拍脈              tsia<sup>8</sup> hiək<sup>8</sup> 食肉  
            中年      bue<sup>3</sup> ba<sup>7</sup> 买脈              tsia<sup>8</sup> hiək<sup>8</sup> 食肉  
            青年      bue<sup>3</sup> ba<sup>3</sup> 买脈              tsia<sup>8</sup> ba<sup>3</sup> 食脈

可见，虽然老年层“脈”已发生了对“肉”第一形式的取代，但“脈”仍然不能自由地在句法层面使用，而且同一年龄层的语言社团对某个动词搭配哪个词形有较为一致的倾向；直到青年层，“脈”才基本不受限制。

A3. 洛阳型：较惠安型更晚一步，从老年到青年“脈”取代“肉”成为第一形式。如惠安洛阳镇，洛江区（万安街道），晋江金井镇。

<sup>12</sup> 据公开资料，李先生是南安人，1936年生。

<sup>13</sup> “脈、拍、食”在螺城均有不带喉塞尾的变体。

### 3.3.2 B 型：“脈”的扩张中止

B1. 鲤城型：上世纪 90 年代的老派，“脈”的地位已经接近“肉”，但随后略有衰退或保持变异。泉州鲤城区、丰泽区，以及个体差异大的晋江（青阳）可归为此类。

鲤城区的老年人普遍反映：几十年前说“脈”比现在多，现在的年轻人“肉”用得更多。要解释一个外来的形式为何未能取代固有词，是相当困难的。这里提出一个设想，即这些地点较早发生由闽南话到普通话的局部语言转用，使得异地闽南方言的接触显著减弱。Weinreich (1953:107) 把语言转用 (language shifts) 分为局部的 (partial) 和完全的 (total)，后者指语言社团中的典型成员在某些领域和场所 (domains and locales) 发生语言转用。也许由于泉州市区、晋江市区非闽南籍的外来人口较多，当然也由于大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程度更高，这些地区较早地、更多地在公共场合换用普通话，这使得与其他闽南方言变体的总交流度降低<sup>14</sup>；“脈”的扩散本就仰赖于各地闽南话的交流，一旦总交流度降低，它就失去了扩散的条件。

晋江各年龄层“肉”义词的个体差异都比较大。缺乏高交流度的说话者，会导致语言规范难以出现 (Fagyal et al. 2010)，晋江的人口流动较大，闽南话的内部交流较少，这可能是变异难以趋同的原因。

B2. 水头型：该类型与鲤城型类似，只是“脈”的扩散更弱一些。南安水头镇从老年到青年，“脈”由第二形式降为非使用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肉”不变。安海镇老年及官桥镇老年、中年的“脈”存在显著个体差异（类似晋江），在安海中年、青年及官桥青年则多数降至非使用理解形式。粗略地说，安海、官桥也可归入水头型。

安海和水头有两份重要的历史文献。17 世纪菲律宾华人的安海话只说 hiək<sup>8</sup> 而不说 ba?<sup>7</sup> (Van der Loon 1967:134)<sup>15</sup>。1800 年《汇音妙悟》除“肉”外也记录了 ba?<sup>7</sup> (表 4)，据曾南逸 (2013:10) 考证，《汇音妙悟》的作者出生于南安梧坑村（今水头镇梧坑村）。水头“脈”至今未取代固有的“肉”，周边发生的取代也只是近几十年发生的。

### 3.3.3 C 型：“脈”只有微弱影响

C1. 石狮型：老年到青年“脈”由非使用理解形式降为不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肉”不变。如石狮城区，泉港区（山腰街道）。

C2. 浯潭型：老年到青年“脈”由不理解形式升为非使用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肉”不变。如晋江浯潭村，石狮大堡村。

C3. 洪厝型：老年层有的能理解“脈”，但中年、青年“脈”没有扩展，或者进一步消退。如石狮洪厝村、泉港邱厝、施厝村，晋江深沪镇。

---

<sup>14</sup> 十余年前，泉州市区普通话在公共场合的运用已压倒性地超过闽南话（林华东、徐贺君 2009）。晋江、石狮自 80 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1988 年，全国各地到两地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就有 15 万多人（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101）。外来人口规模不妨以《泉州统计年鉴 2017》的 2016 年“常住人口”除以“户籍人口”估测，该值越大即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紧密相关）。有 4 个县（市、区）该值高于全市平均值：丰泽、石狮、晋江、鲤城。四地都是“脈”扩张中止或衰退的 B1、C1 型。

<sup>15</sup> 根据一部记录菲律宾华人闽南话的西班牙语-闽南话词典手稿：Bocabulario de la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z de el A.B.C.（《生理话词汇以 ABC 编排》），页 13b。原书有两种转写方式 hicc, hec，这里拟为 hiək<sup>8</sup>。手稿年代 Klöter (2011:56) 估计为 17 世纪。

### 3.4 “脈”的语音变体

泉州方言“脈”有两个语音变体，baʔ<sup>7</sup>分布在绝大多数方言点，而 māʔ<sup>7</sup>只分布在泉州市区及周边半径不到 20 千米的区域——本文调查到的只有鲤城、丰泽、晋江青阳、罗山、磁灶、浯潭。从这一地理分布可知它不是存古的形式，很可能是 baʔ<sup>7</sup>增生鼻化的零星音变所致。《厦英》所记泉州市区的“脈”读 māʔ<sup>7</sup>，说明 19 世纪下半叶已增生鼻化。而《汇音妙悟》的记载说明 1800 年南安梧坑村（距鲤城区约 30 千米）读为 baʔ<sup>7</sup>，与今水头镇的读音是相同的。

### 3.5 小结

泉州沿海地区早期的肉义词是“肉 h-”。虽然有的地点在两百多年前就有“脈”这一语素，但它主要在近几十年开始取代固有的“肉”义词 \*hiək<sup>8</sup>。各点的演替速度不同，同安、金门、南安北部、惠安进展最快。泉州市区、晋江、南安南部等地接受了“脈”作为使用形式但未能取代“肉”；随着异地闽南话之间的交流频度降低，“脈”的扩张中止，或有衰退趋势。石狮、泉港等地“脈”的影响则更微弱。语音方面，泉州市区及周边“脈”读 māʔ<sup>7</sup>是语音创新。

## 四、三类形式的早期分布

### 4.1 “肉 h-”是泉州方言共同词

现在已经知道泉州沿海地区说“脈”是一项创新，早期的肉义词是“肉 h-”。如果要将“肉 h-”上推至整个泉州方言，就绕不开泉州内陆三县安溪、永春、德化，这片广大的区域今只说“脈”而说不说“肉 h-”。从系属上看，内陆三县确属泉州方言无疑，以 Kwok (2018) 的共同闽南语为参照，三县 \*uə>ə, \*oi>ue, \*di>uĩ, \*uĩ>ŋ 等，都是和泉州（如鲤城）的共同创新，而与漳州演变方向不同。如果有证据表明三县过去曾说“肉 h-”，就可以推论三县今天的“脈”是由北、西、南三面的大田、龙岩、漳州方言扩散而来的，进而可以将“肉 h-”上推至整个泉州方言。这里举出两条证据。

清末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从这三县迁出的福建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肉”“脈”二者兼用，如“肉店”[hiək<sup>8</sup> tuĩ<sup>5</sup>]，“脈油”[baʔ<sup>7</sup> iu<sup>2</sup>]{猪油}（陈章太、李如龙 1991:421）。由于顺昌周边方言不说“肉 h-”“脈”，这两个形式也就不可能是与周边方言接触获得，只能是分化时具备，因此两个词曾经都是三县的使用形式。

内部的证据来自残留的复合词。汉语单音节旧词被新词取代后，可能成为构词语素延续使用（汪维辉 2006）。今安溪魁斗、德化等地游泳（或洗澡）说“洗肉”[sue<sup>3</sup> hiək<sup>8</sup>]，便是一例。梅祖麟（2007）认为“洗肉”的本字是“洗浴”，第二音节的 h-是体现上古音的存古。由于厦漳潮汕等都有“洗浴”一词，泉州这个词也源自“洗浴”是稳妥的推论。但是，第二音节读 h-是创新而非存古。因为凡第二字说 h-的地点，基本都在“肉 h-”的分布区，如鲤城、晋江、石狮等；厦漳潮汕等大片区域“浴”均为零声母的、合乎规则的读音。这一分布事实表明：{肉}说“肉 h-”很可能是造成“浴”读 h-这一例外的词汇条件。闽南话“肉、浴”同韵、同调，其变化只在一个喉擦音 h-，前字“洗”读

擦音 s-, 也有利于这一增生。所以, 该词是在“肉 h-”的类音牵引下, 第二音节增生了 h- 声母, 并发生了民俗词源的重新解释, 将内部形式由“洗浴”重新分析为“洗肉”。可以写成(韵母以 \*iək 代):

(9) {游泳/洗澡} sue<sup>3</sup> iək<sup>8</sup> “洗浴” > sue<sup>3</sup> hiək<sup>8</sup> “洗肉” / {肉} hiək<sup>8</sup>

今安溪、德化该词第二字说 h-, 却不在“肉 h-”的分布区, 我们的解释就是“肉 h-”在(9)发生之后被“脈”所替换。另一种可能是, 内陆三县本并不说“肉 h-”, 只是借入了沿海地区第二字读 h- 的词形。该想法的弱点在于, 如果当地肉不说 h-, 则该词形的第二音节语义不透明, 借入这样的形式动机不足。(9)的 h- 增生确实可能是以泉州为中心向外扩散的, 但接受该创新的地区一般需要具备“肉”说 h- 的内在词汇条件。结合顺昌埔上方言岛的词汇变异, 可以确证三县“肉”义词曾经说“肉 h-”。

这三县在地理上紧邻漳州、龙岩、大田等“脈”的分布区, 与这些方言的长期接触使得“脈”取代了固有的“肉”。所以, 3.1.5 总结的“脈”的扩张进程可以加上一环, 即最早的更替发生在内陆三县, 之后才是南部的同安、金门, 等等。

最后, 虽然“肉”n- 变为 h- 是一个音韵创新, 但无须把早期泉州方言的形式拟为“肉 n-”。因为, 音变(3)是广义闽南方言区别于其他闽语的共同创新, 此音变波及到不同词的时间或有先后, 但在可追溯的历史内, 泉州方言的共同形式是已变的“肉 h-”。

#### 4.2 “脈”是漳州、龙岩、大田等方言共同词

泉州和漳州是泉漳小片内的两支主要方言。龙岩(新罗)、漳平、菁城, 大田(前路话)等方言, 具备 \*uo > ue, \*oi > e/ie, \*ōi > eī/ī/an 等与漳州的共同创新, 并跟漳州一样保留 \*ō 和 \*uī 的对立, 故可以认为它们系属漳州方言(郭必之 2016; 陈筱琪 2019)。地理上大田话、龙岩话距离漳州较远, 而且表现出存古特点, 如龙岩话没有发生漳州的阳去、阳上合并的音变, 且存有 -iua 这种“前漳州特征”(陈筱琪 2019:229-235)。这意味着龙岩话晚期与漳州的联系或接触较弱, 不易接收创新的扩散。因此这些方言的“脈”应当继承自共同漳州话, 而非晚近接受漳州话的影响。“脈”还进一步扩散到了西部的闽客过渡方言(万安)和北部的闽东过渡方言(尤溪), 这显示了它的时间深度。

“脈”在汉语中暂无法找到词源, 而新的核心词一般不会无缘地出现, 合理的推论是它是非汉语借词或底层词。这应当视为一个词汇创新。虽说如此, 我们并不主张把漳系方言的共同形式拟为“肉 h-”。理由是: 第一, 今漳州既没有能理解“肉 h-”的方言, 也未调查到“肉 h-”的词汇残余。第二, 文献和移民方言可证“脈”在漳州作为肉义词的历史至少有 400 多年, 但没有说“肉 h-”的证据: 16-17 世纪菲律宾的漳腔闽南话 Sanglely 说“脈”, 不说“肉 h-”(Klötter 2011:133); 明清之际迁出的多个漳腔方言岛或说“脈”, 或借入周边方言词, 但没有说“肉 h-”的, 见(12)。第三, 目前漳州境内尚有分布的畲话{肉}说 [pi<sup>3</sup>]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611)<sup>16</sup>, 语音上看, 它和“脈”来源不同, 因此“脈”应当来源于更早与汉语接触的某种语言。第四, 粤西闽语今只说“肉

<sup>16</sup> 此词可与汉语“胛”比较。《玉篇·肉部》“胛, 波美切, 肉也”。漳州“胛”文读为 pi<sup>3</sup> (Schlegel 1890:797), 但口语不说。

h-”，但粤西吴川粤语（紧邻粤西闽语）、广西宜州阳山粤语（200 多年前由粤北阳山迁至宜州），以及吴川吉兆话（属侗台语，但闽粤方言对其影响很大）都有指“肉”的词 [mɛ]，且声调均为阴调类（李健 2014；张秀珍 2009；邵兰珠 2016），见（10）。宋代至明代闽人大量移民吴川、化州（李健 2014:7），[mɛ]和“脈”语音接近<sup>17</sup>，如果二者确实是关系词，那么[mɛ]或许是比今粤西闽语更早到达的闽语移民所用的词，这批移民今已转用粤语，但留下了“脈”。当然，由于粤北阳山话的后代也有此词，其背后或有更深的的原因。

(10)	吴川粤语	吉兆话	宜州阳山粤语
肉	mɛ <sup>1</sup>	mɛ <sup>3</sup>	mɛ <sup>3</sup>

所以，没有证据也没有必要给漳州、龙岩、大田等方言拟“肉 h-（或 n-）”>“脈”的演变。由于泉州（南安）是闽南开发最早的地区（王育德 2002[1969]:562），不妨认为“脈”是闽南话从泉州南拓至漳州的初期与当地非汉语接触的产物。“脈”在可追溯的历史内是漳系的肉义共同词。

#### 4.3 “肉 n-”是莆仙方言共同词

“肉 n-”与“肉 h-”是鼻音擦化音变（3）发生前后的形式。Swadesh 的 100 核心词中有 4 个词泉漳发生了 h-化，莆仙方言“鱼”“耳”两词已变，读 h-，“肉”“箸”两词则未变，读 n-，见（4）（6）。这反映了莆仙方言的接触历史。

莆仙话拥有闽南话的底层和闽东话的强烈影响（刘秀雪 2004:237）。莆仙地区原属泉州，于宋代分立并长期接受省城福州的影响（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1:2647）。其撮口呼等特点反映了“前泉州特征”，这和龙岩反映“前漳州特征”的情况类似，说明其分化很早。当然，语言或方言的分化时间未必等于政区的分化时间。

可以设想，当闽南的鼻音擦化音变以词汇扩散、地理扩散的形式推开时，莆仙由于与泉州联系较弱，只接受了一部分词的音变，“肉”“箸”没有擦化。另一种可能是，莆仙的“肉”“箸”在早期也读 h-，而后又受到闽东的影响，变回 n-，也就是说“肉”“箸”经历\*n->h->n-的演变。这并非不可能，只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暂不必作如此迂回的设想。况且，潮汕的“肉 n-”与莆仙远隔分布，这显示了“肉 n-”的古老。因此，谨慎的结论是，在可追溯的时间深度内，“肉 n-”是莆仙方言的共同词。

与泉州北部毗邻的仙游借入了“脈”。有以下三个词：“脈”{猪肉}[ma<sup>3</sup>]，“拗脈”{病猪肉}[au<sup>3</sup> ma<sup>3</sup>]，“脈丸”{肉丸}[ma<sup>3</sup> uī<sup>2</sup>]；李如龙等（2019:74）指出[ma<sup>3</sup>]“源自闽南话 ba<sup>2</sup>”。其语音形式可对这一判断提供支持。对同源词而言，泉漳的 b-均在仙游进一步清化为 p-（Bodman 1985），“脈”读 m-与同源词不符。声调方面，泉漳的一部分-2在仙游脱落，原读阴入的字，仙游基本派入阳去[21]，如泉漳“拍”{打}[p<sup>h</sup>a<sup>2</sup>ʔ]，{眨}[ni<sup>2</sup>ʔ]，仙游读[p<sup>h</sup>a<sup>6</sup>] [ni<sup>6</sup>]。仙游“脈”读上声（阴上）[52]，不合上述规律。既明确其为借词，

<sup>17</sup> “脈”的早期形式为\*ba<sup>2</sup>ʔ；参照（14）中尤溪未发生系统性去鼻化音变的读音[ma<sup>7</sup>]，或可拟更早的形式为\*\*ma<sup>2</sup>ʔ，也是阴调类。

再考察借源。泉州北部重镇惠安阴入读[43]<sup>18</sup>，阳入[23]，晚近兴起的泉港阴入读[5]，阳入[42]，仙游虽直接与泉港接壤，但泉港并不说“豚”，况且泉港的阴入与仙游上声调值并不接近，反而是阳入与其接近，所以泉港不是借源。惠安阴入[43]和仙游的舒声[52]接近，因此仙游的“豚”可能是从惠安借入，声母和调值均按照近似匹配。

仙游的“豚”似只用于猪肉、肉丸等词，贸易类是易借性强的义类(Franco et al. 2019)，食用肉常参与买卖，自然有更大机会成为借词。事实上，在第3章对泉州方言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肉粽”“炸肉”等词中，“豚”的扩散进程快于核心的肉义词。因此，仙游的“豚”为闽南话借词，且从语义、构词看且它尚不能算肉义词的第二形式。

#### 4.4 潮汕方言 19 世纪“肉 n-”“豚”并用

潮汕方言（不含汕尾地区和云澳，详见 5.1）今一致说“肉 n-”，与莆仙相同，且没有词汇变异。本节用历史文献（表 3）、早期迁出的移民和残留的复合词三方面证据，说明潮汕早期也说“豚”。

表 3：潮汕方言历史文献的“肉”义词

文献及时间	音韵地位/页	音{义}	汉字
《击木知音》1915	文胶上入	baʔ <sup>7</sup>	月
Dean 1841	22	{flesh} nek <sup>8</sup>	肉
	39	{beef} gu <sup>2</sup> baʔ <sup>7</sup>	牛肉
	39	{pork} tu <sup>1</sup> baʔ <sup>7</sup>	猪肉
Duffus 1883	110	{flesh} nek <sup>8</sup> ; baʔ <sup>7</sup>	—
	176	{meat} nek <sup>8</sup>	—
	207	{pork} tu <sup>1</sup> nek <sup>8</sup> ; tu <sup>1</sup> baʔ <sup>7</sup>	—
Fielde 1883	10	baʔ {flesh; meat}	月
	391	nek <sup>8</sup> {Flesh; meat; the edible part; corporeal}	肉
Lim 1886	63	nek <sup>8</sup> {Flesh}	肉
	87	gu <sup>2</sup> baʔ <sup>7</sup> , gu <sup>2</sup> nek <sup>7</sup> {beef}	牛肉
	87	iē <sup>2</sup> baʔ <sup>7</sup> , iē <sup>2</sup> nek <sup>7</sup> {mutton}	羊肉
	87	tu <sup>1</sup> baʔ <sup>7</sup> , tu <sup>1</sup> nek <sup>7</sup> {pork}	猪肉

潮汕韵书《击木知音》文母胶部上入收“月”字<sup>19</sup>，Fielde（1883）对[baʔ<sup>7</sup>]也只写“月”而不写“肉”，可见潮汕方言有此俗字习惯。今潮州老派“月（肉）字旁”一般读“肉字盼”<sup>20</sup> [nek<sup>8</sup> zi<sup>6</sup> pōi<sup>2</sup>]，也有人读“豚字盼” [baʔ<sup>7</sup> zi<sup>6</sup> pōi<sup>2</sup>]。

其他教材、词典中，Dean（1841）出版于泰国曼谷，flesh 说“肉 n-”，而猪肉、

<sup>18</sup> 惠安的阴入一般记为[4]，实际略有下降，严式可记为[43]。

<sup>19</sup> 《击木知音》在经韵（-eŋ/ek）没有收录“肉 n-”，可能的原因是，潮汕的鼻音和浊塞音已经音位化为两套声母，传统的声母“十五音”格局在“柳母经韵入声”的地位上已不能容纳 lek 和 nek 两个对立的音节，故该音韵地位只收录了读 lek 的字。

<sup>20</sup> 《集韵·删韵》：“盼，步还切，片也。”泉漳潮汕俗字“𠂔”。

牛肉都以“豚”为中心语素，没有记录“肉 n-”的变体。Duffus (1883) 记录的是本土潮州府方言，其自序说：“（本书）从汕头地区多种方言中选择的，是潮州府使用的方言；没有故意收录任何一个在潮州府不流行的词或词组。根据这一原则，熟悉汕头方言的人最习见的许多表达被排除在外。”<sup>21</sup>书中 flesh 列出“肉 n-”和“豚”两个变体，可见“豚”在当时的潮州无疑是使用形式。Fielde (1883) 指出“肉 n-”除了指肉，还指“可食用的部分”“肉体的”，Lim (1886) 记有“刀肉”[to<sup>1</sup> nek<sup>8</sup>]{刀刃}，这都说明“肉 n-”的高能产性。而“豚”语义单一，只能构成几个复合词，如“猪豚”“无骨无豚”[bo<sup>2</sup> kut<sup>7</sup> bo<sup>2</sup> ba<sup>2</sup>?]{没骨头也没肉；除了气味什么都没有}“无肉无豚”[bo<sup>2</sup> nek<sup>7</sup> bo<sup>2</sup> ba<sup>2</sup>?]{没有肉}。Lim (1886) 的作者是海峡殖民地（新加坡）的翻译官，他记录猪肉、牛肉、羊肉的第一形式都是“肉 n-”，第二形式是“豚”。总之，19 世纪潮汕本土与东南亚潮汕方言都存在“肉 n-”“豚”的变异，“豚”是使用词，但“肉 n-”在多义性、搭配能产性上都高于“豚”。

对比潮汕和仙游的“豚”，语音上潮汕的“豚”和泉漳形成规则对应，无法据此认定为借词，而仙游明显为借词；语义和用法上，潮汕“豚”不限于猪肉及其制品，且可以构成“无肉无豚”这样的固定搭配，说明潮汕的“豚”比仙游的更深地融入词汇语义系统。

今天国内潮汕方言已不说“豚”，但海外潮汕话则多有保留。李永明 (1959:190) 便指“豚”为“南洋华侨的说法”。有一种观点是国内潮汕话一直只说“肉 n-”，东南亚潮汕话的“豚”是与东南亚泉漳话接触而来的（如陈晓锦 2014:969）。从历史文献看，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且本土潮汕话仍有复合词残留，除了上述的“月（肉）字旁”，还有：{胖}，有人说“豚豚”[ba<sup>2</sup>? ba<sup>2</sup>?]，闽语多有名词重叠作形容词的形态手段，这是早期“豚”作名词的证据；“惜豚”[sio<sup>7</sup>? ba<sup>2</sup>?]{疼爱}，更多人说[sio<sup>7</sup>? nek<sup>8</sup>]，用于安抚受伤或难过的小孩；一种香蕉叫“豚蕉”[ba<sup>2</sup>? tsio<sup>1</sup>]（蔡俊明 1991:785）。邻近的漳州，说“豚蕉”，但不说“豚豚”“惜豚”，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潮汕的“豚”是晚近从漳州借入的。东南亚潮汕话“豚”的留存，可以有当地泉漳话的支持作用，但根本上还是因为移民在迁出时就带有变体“豚”。

19 世纪潮汕兼说“肉 n-”“豚”，此时肉义第一形式是“肉 n-”，“豚”是重要的第二形式。二者形成了一定的语境互补。此后，在语义、搭配上比较受限的“豚”被“肉 n-”取代，这是方言自身同义竞争的结果。

#### 4.5 新生的接触方言厦门话只说“豚”

今厦门话和漳州方言相同，只说“豚”且不能理解“肉”。厦门话（思明区的方言）被公认为一种泉漳混合方言（王育德 2002[1969]:7-8；李如龙 1997:248），其形成时间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因《翻译英华夏腔语汇》（Doty 1953）编成时厦门话已经定型。混合方言是一种短时间内新生的方言，所以不能从厦门岛历史上隶属泉州府同安县来判定它

<sup>21</sup> 原文: From many varieties of dialect found in the Swatow region that has been chosen which is spoken in the city of Ch'ao-chow-foo; and no words or phrases not current there have been knowingly admitted. By this rule many expressions are excluded which must be amongst the most familiar to persons acquainted with the general speech of the Swatow people.

和同安一样经历了“脈”对“肉 h-”的替换。从历史文献记录的词汇变异情况可知，新生的厦门话一直以“脈”作为肉义词。

表 4: 泉厦漳历史文献的“肉”相关词

文献及时间	音韵地位/页	口语	音韵地位/页	书面语
《汇音妙悟》1800	喜卿下入 文嘉上入	hiək <sup>8</sup> 鱼~ baʔ <sup>7</sup> 土话	入香下入	dziok <sup>8</sup> 管~
《十五音》1818	门胶上入	baʔ <sup>7</sup> 皮~	入恭下入	dziok <sup>8</sup> 肌~
《渡江书》?	门嘉上入	baʔ <sup>7</sup> 皮~	入恭上入	dziok <sup>8</sup> 猪~
《八音定诀》1894	文佳上入 喜灯下入	baʔ <sup>7</sup> 羊~ <sup>22</sup> hik <sup>8</sup> 猪~	入香上入	dziok <sup>8</sup> 骨~
《语汇》1853	34, 51	baʔ <sup>7</sup>		
《口才集》1869	30	baʔ <sup>7</sup>		
《厦英》1873 所记的 厦门话	8-9 124	baʔ <sup>7</sup> hik <sup>8</sup>	183	dziok <sup>8</sup> 骨~

表 4 区分口语和书面语，[dziok<sup>8</sup>]作为“肉”字的文读音，是闽南话书面语中肉义词的形式；民国以后闽南话正式语域逐渐萎缩，这个形式也随之逐步淘汰。论及核心词，仍应以口语为准。泉腔韵书《汇音妙悟》兼有两词，漳腔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仅有“脈”。厦腔韵书中，《渡江书》不收“肉 h-”，《八音定诀》则收录，不过《八音定诀》兼收同安等多种变体，并不能代表厦门话词汇的真实情况。较早的《语汇》和《英华口才集》(MacGowan 1869)都只收“脈”一个形式，大部头《厦英》则记录了“肉 h-”。《厦英》[baʔ<sup>7</sup>]有肉、猪肉、果肉、仁儿、(刀)锋、(镜)面、(扇)叶等语义，并举 43 个词或固定搭配(个别其实是词组)，可见其构词能产性高，语义引申丰富；[hik<sup>8</sup>]义为 flesh，是不成词语素，是与书面语[dziok<sup>8</sup>]对应的口语形式，举 5 个词，见(11b)。这 5 个词现代厦门的一位母语者(女，调查时 72 岁)都不能理解。

(11)	a	b	c
身体	sin <sup>1</sup> 身 k <sup>h</sup> u <sup>1</sup> 躯 (434) <sup>23</sup>	hik <sup>8</sup> 肉 sin <sup>1</sup> 身 (124)	dziok <sup>8</sup> 肉 sin <sup>1</sup> 身 (183)
血亲 I	kut <sup>7</sup> 骨 baʔ <sup>7</sup> (9)	kut <sup>7</sup> 骨 hik <sup>8</sup> 肉 <sup>24</sup>	kut <sup>7</sup> 骨 dziok <sup>8</sup> 肉
血亲 II		ts <sup>h</sup> in <sup>1</sup> 亲 kut <sup>7</sup> 骨 hik <sup>8</sup> 肉	ts <sup>h</sup> in <sup>1</sup> 亲 kut <sup>7</sup> 骨 dziok <sup>8</sup> 肉
很瘦	san <sup>3</sup> 瘡 <sup>h</sup> i <sup>7</sup> ? t <sup>h</sup> i <sup>7</sup> ? (409)	siaʔ <sup>7</sup> 削 kut <sup>7</sup> 骨 lo <sup>8</sup> 落 hik <sup>8</sup> 肉	
一种贝肉		ɔ <sup>1</sup> lam <sup>2</sup> hik <sup>8</sup> 肉	

(11a) 是口语词，(11c) 则是书面语词，均取自《厦英》。身体、血亲 I、很瘦等 3 个词有近义的口语常用词。身体和血亲 I、II 又具有相应的文读形式，“削骨落肉”{很瘦}大概也基于书面语词的格式，即这 4 个词的构词模板是书面语既有的，只是使用

<sup>22</sup> 此外，《渡江书》在文三上入[māʔ<sup>7</sup>]也收“肉，皮~”。但《渡江书》的鼻化韵收录了许多应为口元音韵的字，故此音存疑。

<sup>23</sup> 括号内为原书页码，同上一行的不标。

<sup>24</sup> 原为俗谚：hiā<sup>1</sup>-ti<sup>6</sup> nā<sup>3</sup> kut<sup>7</sup>-hik<sup>8</sup> (兄弟若骨肉)，这里取“骨肉”一词。



了语素 hik<sup>8</sup>。可以推测这 4 个词当时是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较文雅的说法<sup>25</sup>。被替换的单音词可以残留若干由其组成的复合词或派生词，上文已有诸多例证，如安溪魁斗{洗澡}说“洗肉”，潮汕{胖}说“豚豚”，但它们都不具有文雅色彩<sup>26</sup>。这与(11b)具有文雅色彩截然不同。因此，相比底层残留，(11b)更像是补充型借词(luxury loanword/addition)。或者说，hik<sup>8</sup>是母语者可感知的跟 dziok<sup>8</sup>同源的词，这使得它在形式上具有吸引力，一些文化人便可能借入 hik<sup>8</sup>，用以构成介于俚俗和正式之间的文雅词，以丰富词汇系统。hik<sup>8</sup>并非厦门话被替换的核心词，而是借用的语素，借源自然是泉州方言。泉州方言老派仍有相对文雅的[hik<sup>8</sup> sin<sup>1</sup>]和[ts<sup>h</sup>in<sup>1</sup> (sī<sup>1</sup>生) kut<sup>7</sup> hik<sup>8</sup>]。

事实上，厦门话虽然在韵母方面更多地与泉州相似，但复杂的连读变调系统则与漳州接近，在 5 个泉漳有差异的核心词上，其早期的第一形式都与漳州相同。这使我们认为厦门话的底层是漳州话，“豚”是显示其底层的核心词，而早期厦门话语素“肉 h-”的文雅色彩，恰好反映了泉州方言作为上层方言的存在。

## 五、“肉”义词分布与演变揭示的方言接触现象

张梦翰等(2016)以音系为材料，通过计算和模拟，印证了闽南方言从东北向西南传播的移民史和语言史，不过未将莆仙纳入研究。在肉义词变项上，闽地的三支重要移民来源方言——莆仙、泉州、漳州，恰好各自具有一类早期形式，不妨借此管窥移民方言与三支方言的历史关系：

- (12) 莆仙“肉 n-”：潮汕  
 泉州“肉 h-”：雷州、琼文  
 漳州“豚”：台湾、潮汕

这一核心词历史指向，有些与音韵所显示的亲缘关系不一致，如琼文闽语常被视为漳系而非泉系(如何大安 1981)。当然，不能凭一个词的演变确定历史关系。况且，核心词反映的历史关系究竟是谱系继承关系还是接触关系，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佐证，因为核心词可以发生接触替代，近代泉州方言即为一例。或许更有意义的讨论是从肉义词的演变考察方言接触的规律。

### 5.1 大片移民方言区与小规模移民方言岛的不同演变趋势

首先看几个大片移民方言区的演变，这里暂不考虑哪个形式取胜，而考虑是否涌现出一个共同形式。台湾闽南话基本是清中叶前的泉漳移民带去的(李如龙 1997:103)。今台湾闽南话，音韵等方面的差异仍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方言的泉、漳谱系来源，但肉义词变项已经发生推平(leveling)——无论偏漳腔、通行腔还是偏泉腔都一致说“豚”，就连边远的琉球屿、绿岛偏泉腔都是如此。雷州和琼文方言大抵是宋元明的福建移民带

<sup>25</sup> 第 5 个词暂且搁置。从构词规律看，ɔ<sup>1</sup> lam<sup>2</sup>似指一种贝类，但《厦英》不著该词。《厦英》另收同安的同义词 ɔ<sup>1</sup> kui<sup>3</sup> hik<sup>8</sup>。

<sup>26</sup> 汉语史上核心词替换后被降格保存，不少具有文雅色彩(汪维辉 2018)。这与本文描述的语言演变场景不同，前者通常留下大量经典文本赋予老语素以文雅色彩，而后者并没有这个条件。

至（李新魁 1994:423；陈波 2008:21），它们的移民来源地也不单纯。合理的设想是它们在肉义词变项上曾存在初始变异，但现状是，在我们考察到的方言中无一例外地涌现出了共同形式“肉 h-”（或 h-、零声母变体）。类似的情形是，东南亚的泉漳潮汕方言第一形式多为“脈”（陈晓锦 2014:669,969）。可见至少在已调查的东南亚闽南话里，也相当程度地发生了肉义词的共同化。

粤东的汕尾地区和南澳岛东的云澳是小规模的漳州方言岛。云澳继承了漳州的形式，说“脈”[baʔ<sup>7</sup>]。汕尾地区（常称“海陆丰”）的闽南话也属于漳州方言（郑至君、郭必之 2017），其人口主要是明初至清初从漳州迁入的，与更早从闽地分化的潮汕方言不同。今汕尾、陆丰仍以“脈”为第一形式，海丰的第一形式则替换为[niok<sup>8</sup>]，“脈”退居第二形式。[niok<sup>8</sup>]是混成形式，其声母借自潮汕的[nek<sup>8</sup>]，韵母则取自本有的文读形式-iok<sup>8</sup>（漳州[dziok<sup>8</sup>]）。但这一演变不能视为只是替换了文读音的声母，因为文读语素本非口语核心词，需要将这一文读语素的语义、语法进行改造。所以，最好将其分析为借用潮汕的[nek<sup>8</sup>]，并在语音上作了整合（integration），以文读韵母代之。

明清之际迁往粤桂赣三省的多个漳腔方言岛，今肉义词的说法见（13）。由于漳州一直只说“脈”，可推定这些方言迁出时肉义词没有初始变异。其结果有两类：多数方言继承了“脈”，如（13a），其语音的差别都由音变造成。少数方言从周边借入新词，如（13b）的乐昌塔头坝第一形式是从粤语借入的[ŋau<sup>2</sup>]，[mã<sup>7</sup>]是第二形式；海丰话第一形式是从潮汕话借入的[niok<sup>8</sup>]，[baʔ<sup>7</sup>]是第二形式。

- |      |    |                                     |                                      |                                     |                 |                  |
|------|----|-------------------------------------|--------------------------------------|-------------------------------------|-----------------|------------------|
| (13) | a. | 云浮罗定                                | 英德鱼咀                                 | 郁南连滩                                | 平乐周塘            | 赣县安平             |
|      |    | ʃa <sup>3</sup>                     | va <sup>5</sup>                      | ba <sup>3</sup>                     | pa <sup>5</sup> | ma <sup>8</sup>  |
|      | b. | 乐昌塔头坝                               | 海丰                                   |                                     |                 |                  |
|      |    | ŋau <sup>2</sup> ; mã <sup>7</sup>  | niok <sup>8</sup> ; baʔ <sup>7</sup> |                                     |                 |                  |
| (14) |    | 顺昌埔上                                | 苍南灵溪                                 | 温州洞头                                | 玉山紫湖            | 广丰铜山             |
|      |    | hik <sup>8</sup> ; baʔ <sup>7</sup> | hie <sup>8</sup>                     | hiək <sup>8</sup> ; ba <sup>3</sup> | he <sup>8</sup> | hie <sup>8</sup> |

泉腔方言岛例见（14）。虽然早期泉州方言只说“肉 h-”，但清代已有部分方言使用“脈”，所以不便于判断上述方言迁出时是否具有初始变异。顺昌埔上和温州洞头至今还保留“肉 h-”“脈”两个形式，则可断定二者具有初始变异。埔上主要是清代的泉州内陆三县移民，洞头主要是清代的同安移民。

表 5 比较了大方言区和小方言岛的肉义词演变，可以归纳出两个现象：第一，当存在初始变异时，大方言区基本上推平变异，小方言岛则有保留变异的例子，如埔上和洞头；第二，大方言区没有借入新词的例子，小方言岛则有，如塔头坝和海丰。

<sup>27</sup> 汉语较大的方言片似只有四邑粤语肉说“肴”（汪维辉 2018:1077ff），如台山[<sup>9</sup>gau<sup>2</sup>]（詹伯慧、张日昇 1987:137）。根据蔡玄晖的调查，塔头坝方言没有在四邑粤语区逗留的历史，而是曾在粤西的郁南连滩长期停留。同处粤西的怀集下坊话猪肉说[ŋau<sup>6</sup>]（杨璧菡 2012），“肴”可能有更大的分布范围。中山闽语肉也说“肴”，陈小枫（1996）认为是从粤语借入。

表 5: 大方言区与小方言岛的“肉”义词演变比较

情景 演变	大片移民方言区	小规模移民方言岛	
	有初始变异	有初始变异	无初始变异
变异推平	台湾、雷州、琼文、(东南亚)	?	-
变异保留	无	埔上、洞头	-
借入新词	无	?	塔头坝、海丰

如果将核心词的词汇变异视为词汇语义系统高复杂度的表现,则两个现象可以概括为:大方言区倾向于降低复杂度,小方言岛则倾向于保持和增加复杂度。这基本与 Trudgill (2011) 对于人口结构与语言复杂度关系的观察一致。本文的个案显示了小方言岛保持和增加复杂度的两条途径,一是保持内部的变异,即保持语义对立的精细 (overspecification) 或冗余 (redundancy),二是由于小方言岛势力弱,更可能伴随双方言现象,所以容易借入周边强势方言的核心词,进而增加词汇语义系统的复杂度。

如果将泉漳小片看成一个方言区域,那么清代以来泉州方言“豚”的扩张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化、推平、趋同的过程 (Winford 2003:82f, 99),这跟表 5 所述大片移民方言区经历的演变本质上一致。“豚”在泉州沿海地区的扩张尤其集中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跟 19 世纪中叶以后厦门话成为区域通语的时间吻合,与厦门邻近的同安、金门的肉义词快速更替也可证实厦门话的影响。内陆三县与漳系方言的接触则更早一些,它们在接受了漳系形式后,转而向东影响了南安等地,在这一推平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来说,可以看到清代尤其是厦门开埠后,直至大约 1990 年闽南话异地接触开始衰弱时,泉漳区域趋同的力量是较大的。由此可见,大片方言区的推平依赖于内部的高交流度,而区域通语的存在会加快这一过程。潮汕亦经历了变异的推平,但其机制是词汇语义系统内部的简化。台湾、雷琼、东南亚闽南话早期的推平机制,可从二者中得到启发。

当然,每一种方言在某个变项上的演变机制及最终结果是一个优选的过程,牵涉到该变项的显性程度 (Zeng 2018)、变体本身的吸引力 (Johanson 2002)、语言权势等诸多因素,不是仅凭人口结构就能决定的。所以对于各移民方言为什么选择了某形式而非另一个,本文不作过多的解释。

## 5.2 混合方言与混成形式

尤溪西洋、中仙具有混成形式<sup>28</sup>。从图 1a 可见,它们分布在地理的边缘,是混合方言或过渡方言。

尤溪境内 7 种方言的肉义词如 (15) 所示。鸭、{躲} (“肭”) 都是共同闽南语喉塞尾阴入调 (如厦门),且“鸭”韵母同“肭”,“肭”声母同“肭”,故一比较。尤溪 (城关)、新桥、街面、汤川的“肭”与另两词对应整齐,“肭”是符合规则的读音;其中新桥阴入并入阴去,汤川部分阴入归阴去。西洋的第一形式是 [na<sup>7</sup>], 声母 n-, 声调入声 (不分阴阳), 来源于闽东的“肉”, 而韵母 -a 来自“肭”; 还有读为阴去的语音变体, 是受

<sup>28</sup> 岩田礼 (2007) 称“混淆形式”。吕晓玲 (2016) 指出泉州方言的给予义动词也有音节内混成现象, 称“语音感染”。

第二形式“脈”[ma<sup>5</sup>]牵引产生的。[ma<sup>5</sup>]是“脈”的规则读音。中仙部分浊入归阴平，部分清入归阴去，[ma<sup>1</sup>]声母韵母都源自“脈”，但声调例外地同部分浊入一道归阴平，正符合“肉”的调类，我们也将其视为混成形式。洋中属闽东方言，肉义词是闽东的形式。

(15)	尤溪	新桥	街面	汤川	西洋	中仙	洋中	厦门
肉	ma <sup>7</sup>	ma <sup>5</sup>	ba <sup>7</sup>	ma <sup>5</sup>	na <sup>7</sup> /na <sup>5</sup> /ma <sup>5</sup>	ma <sup>1</sup>	(ny <sup>7</sup> )	ba <sup>7</sup>
鸭	a <sup>7</sup>	a <sup>5</sup>	a <sup>7</sup>	a <sup>5</sup>	a <sup>5</sup>	a <sup>5</sup>	a <sup>7</sup>	a <sup>7</sup>
躲	mi <sup>7</sup>	(tu <sup>2</sup> )	be <sup>7</sup>	me <sup>5</sup>	me <sup>5</sup>	me <sup>5</sup>	(miŋ <sup>1</sup> )	bi <sup>7</sup>

最后讨论“闽客混合方言”万安话的肉义词[mo<sup>6</sup>]。如(16)，万安、梧宅、松洋“脈”的声母（万安 m： 泉漳 b）、韵母、声调（阴入与阳去合并）都是规则对应，不是混成形式。但是，万安、梧宅的韵母成为-o 并非自然音变。与相邻的连城县城关的客家话（何纯惠 2014）及漳州闽南话作比较，显然万安等方言的韵类划分与连城一致，且万安、梧宅和连城都读-o(?)；漳州则分为两个韵类（不计舒促），咸摄一二等为-a<sup>?</sup>，假、梗摄二等多为-ε(?)。如果我们赞成 Branner (1999:98) 的分析，即万安等方言本质上是闽语，并受到客家话的强烈影响，那么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接触音变的解释：万安的闽南祖语的两个韵类在客家话的影响下合并，且音移成和连城同音的-o。该韵类有闽南不说的词，如“拿”；也有客家不说的词，如“脈”。从结果看，“脈”形成规则对应；但从动因看，\*a<sup>?</sup>>o 离不开与客家话的接触，即便客家本身并不说“脈”。

(16)	万安	梧宅	松洋	梨岭	下村	连城	漳州
肉	mo <sup>6</sup>	mo <sup>6</sup>	ma <sup>6</sup>	(niə <sup>7</sup> )	(ŋiə <sup>7</sup> )	(niə <sup>6</sup> )	ba <sup>7</sup>
蜡咸开一盞	lo <sup>7</sup>	lo <sup>7</sup>	la <sup>7</sup>	lɔə <sup>7</sup>	lɔ <sup>7</sup>	lo <sup>5</sup>	la <sup>7</sup>
鸭咸开二狎	o <sup>6</sup>	o <sup>6</sup>	a <sup>6</sup>	ɔə <sup>7</sup>	ɔ <sup>6</sup>	o <sup>6</sup>	a <sup>7</sup>
茶假开二麻	tso <sup>2</sup>	tso <sup>2</sup>	tsa <sup>2</sup>	ts <sup>h</sup> ɔə <sup>2</sup>	tsɔ <sup>2</sup>	ts <sup>h</sup> o <sup>2</sup>	tɛ <sup>2</sup>
拿假开二麻	-	no <sup>1</sup>	na <sup>1</sup>	nɔə <sup>1</sup>	nɔ <sup>1</sup>	no <sup>1</sup>	(t <sup>h</sup> e <sup>7</sup> )
客梗开二陌	k <sup>h</sup> o <sup>6</sup>	k <sup>h</sup> o <sup>6</sup>	k <sup>h</sup> a <sup>6</sup>	k <sup>h</sup> ɔə <sup>7</sup>	k <sup>h</sup> ɔ <sup>6</sup>	k <sup>h</sup> o <sup>6</sup>	k <sup>h</sup> ɛ <sup>7</sup>

值得一提的是，梨岭的肉义词是“肉”，和下村、连城相同，但有“脈”[mɔə<sup>7</sup>]用于指“月（肉）字旁”（Branner 1999:297）。这和远隔的潮汕呈现惊人的平行。梨岭可能和潮汕一样，“脈”在肉义位上被淘汰，但保存了语素并获得了语义分工。此外，崔荣昌（2002）调查了重庆大足区天山乡徐姓方言点，他们在乾隆 17 年（1752）从漳州府万安里（今万安）迁至大足，今已转用西南官话，“仅在部分常用语词中保留着闽语的特色”。在所列的约一百个具有闽语特色的词中，就有肉义词[ma<sup>53</sup> ma<sup>53</sup>]（调类不明）。一种可能是，徐姓的祖籍地恰在离漳州较近的地方，如松洋；另一种可能是，早期万安一带方言“脈”（及所在韵类）读-a(?)的地理范围比今天更大。

总之，混成形式的成因各异。西洋涉及“肉”和“脈”语音的相互牵引。中仙涉及声调的类推。5.1 讨论的海丰话，它借入潮汕的 nek<sup>8</sup> 时将其韵母改换成本有的文读音韵母-iok<sup>8</sup>。万安话“脈”的韵母受邻近客家话影响从\*-a<sup>?</sup>变成-o，在词汇层面不造成例外

的混成形式，但在音系层面显示出接触的性质。

## 六、结论

在历史文献之外，地理分布、早期分化的方言，共时的代际差异（如泉州沿海地区）、构词变异（如潮汕话复合词残余）、语义变异（如早期厦门话“肉 h-”的文雅色彩）都是颇具效力的词汇演变证据。本文是对这套方法的综合运用。

广义闽南方言肉义词可归纳为三类形式：“豚”“肉 h-”“肉 n-”。h-是 n-发生擦化音变的结果，二者处在同一历史层次，“豚”可能是非汉语底层词或借词。其分布和演变特点包括：（1）泉州方言早期不说“豚”，大约清代以来“豚”从西、南两个方向逐步扩散，在部分方言取代“肉 n-”，部分方言由于闽南话的异地交流度降低而中止扩散。（2）潮汕方言 19 世纪以“肉 n-”为第一形式，以“豚”为第二形式，而后有标的“豚”被淘汰。（3）厦门话的肉义词一直是“豚”。（4）闽南迁出的大方言区，台湾和雷琼都推平初始变异，涌现出区域共同的肉义词；而小方言岛，在有初始变异时可能保存变异，并可能从周边借入新的肉义词。泉州接受“豚”的扩散也可视为泉漳方言的区域推平。（5）混成形式多出现在过渡或混合方言中。

肉义词的分布暗示了莆仙和潮汕，泉州和雷琼，漳州和台湾、潮汕的历史关系，有待于其他语言证据的检视。

**附记：**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文学院数字中文创新实验室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软件绘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 AutoNavi-GS(2019)6379 号）。本文第 3 章由笔者在曾师晓渝教授指导下的本科毕业论文改写而成，相关部分曾在“语言变异与演变”青年学者工作坊（2018，上海）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写作过程中承蒙远藤光晓教授、黄河博士、刘巍、鄢卓、刘欣、刘京杰、林旭娜、贺家豪提供帮助；曾晓渝教授、雷力审阅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张泓玮与笔者讨论了注 21 的翻译问题。谨致谢忱！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2003《汉语方音字汇》，北京：语文出版社。  
蔡俊明 1991《潮州方言词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蔡玄晖 2009《珠江流域五个漳腔闽南方言岛调查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柴田武 2018《语言地理学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保亚、汪锋 2006《论核心语素表的确立——以上古汉语为例》，《语言学论丛》第 33 辑。  
陈波 2008《海南方言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  
陈晓锦 2014《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  
陈筱琪 2008《广东陆丰闽南方言音韵研究》，国立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陈筱琪 2019《闽南西片方言音韵研究》，上海：中西书局。  
陈云龙 2012《粤西闽语音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陈云龙、蔡蓝 2005《徐闻(下洋)闽语的声韵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

- 陈小枫 1996《略论粤方言对中山闽语词汇系统的影响》，《语文研究》第4期。
- 陈章太、李如龙 1991《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陈正统 2007《闽南话漳腔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 崔荣昌 2002《四川境内的闽方言》，见李如龙主编《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戴由武、戴汉辉 1994《电白方言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邓晓华 1994《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第3期。
- 丁度 [宋]《集韵》，钦定四库全书本。
- 丁月香 2017《江西玉山县紫湖闽南话语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杜依倩 2007《海口方言(老派)同音字汇》，《方言》第2期。
-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8《福建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高洵 2010《汕尾城区渔民新村方言词汇调查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顾野王 [梁]《大广益会玉篇》，张氏泽存堂刊宋本玉篇本。
- 郭必之 2016《大田前路话在闽语中的位置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见郑伟主编《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论集》，上海：中西书局。
- 何纯惠 2014《闽西中片客家话与混合方言音韵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何大安 1981《澄迈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1分。
- 胡松柏 1998《赣东北闽南方言略说》，《方言》第2期。
- 黄典诚 1985《闽南方言中的上古汉语单词残余》，《厦门大学学报》增刊。
- 黄河 2017《社会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微观方言研究——以宜兴方言为个案》，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黄谦 1800《汇音妙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影印上海萃英·大一统书局 1905年影印本。
- 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晋江市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李健 2014《吴化粤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如龙 1997《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龙 1999《福建县市方言志 12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龙、刘福铸、吴华英、黄国城 2019《莆仙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张其兴 2015《尤溪县方言志》，福州：海峡书局。
- 李新魁 1994《广东的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永明 1959《潮州方言》，北京：中华书局。
- 梁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梁猷刚 1986《海南岛文昌方言音系》，《方言》第2期。
- 林华东、徐贺君 2009《闽南地区双言现象与语言生活和谐问题——以泉州市区市民语言使用状况为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林连通 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伦伦 1996《澄海方言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 林伦伦 2006《粤西闽语雷州话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林伦伦、林春雨 2007《广东南澳岛方言语音词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刘新中 2004《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秀雪 2004《语言演变与历史地理因素——莆仙方言:闽东与闽南的汇集》，国立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媛媛 2017《茂名鳌头、袂花闽语语音研究》，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2《龙岩地区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罗志海 2009《海丰方言辞典》，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 吕晓玲 2016《近代泉州、厦门方言给予义动词读音的演变——兼谈漳州方言的给予义动词“互”》，《中国语文》第5期。

- 梅祖麟 2007《闽语“舆”、“浴”两字阳调 h-声母的来源——比较方言中所见的\*gl-复辅音》，《方言》第4期。
- 秋谷裕幸 2018《闽东区宁德方言音韵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泉州市统计局编《泉州统计年鉴 2017》。  
[http://tjj.quanzhou.gov.cn/tjzl/tjsj/ndsjs/201709/t20170925\\_541618.htm](http://tjj.quanzhou.gov.cn/tjzl/tjsj/ndsjs/201709/t20170925_541618.htm)
- 邵兰珠 2016《广东吉兆话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宋婕妤 2015《赣南闽南方言安平话语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汪维辉 2018《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汪维辉 2006《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第2期。
- 王育德 2002《闽音系研究》，台北：前卫出版社。
- 温端政 1991《苍南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谢秀岚 1818《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影印文林堂本。
- 辛世彪 2013《海南闽语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鄢卓 2021《壮语核心名词的语言地图及解释》，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岩田礼 2007《方言接触及混淆形式的产生——论汉语方言“膝盖”一词的历史演变》，*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117-146.
- 佚名 1894《八音定诀》，厦门汇文书局 1924年石印本。
- 佚名 1915《击木知音》，瑞成书局本。
- 佚名 [年代不详]《渡江书十五音》，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年影印抄本。
- 曾南逸 2013《泉厦方言音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曾蓉蓉 2008《浙南洞头闽南方言语音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 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 张光宇 1989《闽方言古次浊声母的白读 h-和 s-》，《中国语文》第4期。
- 张梦翰、金健、潘悟云 2016《闽南方言传播模式的计量分析》，《语言科学》第5期。
- 张屏生 2007《台湾地区汉语方言的语音和词汇》，台南：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
- 张盛裕 1981《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第1期。
- 张秀珍 2009《宜州阳山话同音字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
- 张以文 2017《福建诏安闽南方言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振兴 1984《福建省龙岩市境内闽南话与客家话的分界》，《方言》第3期。
- 赵加 1991《试探闽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
- 郑至君、郭必之 2017《粤东闽南语的分群》，《语言学论丛》第56辑。
- 中嶋幹起 2002《海南島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Bodman, N. C. 1985. The reflexes of initial nasals in Proto-Southern Min-Hingua.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20, 2-20.
- Branner, D. P. 1999.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in and Hakka*.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Dean, W. 1841.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Bangkok: —.
- Doty, E. 1853.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Canton: S. Wells Williams.
- Douglas, C.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 Duffus, W. 1883.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Fagyal, Z., S. Swarup, A. M. Escobar, L. Gasser & K. Lakkaraju. 2010.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Network roles in language change. *Lingua* 120(8), 2061-2079.
- Field, A.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Franco, K., D. Geeraerts, D. Speelman & R. van Hout. 2019. Maps, meanings and loanwords: The interaction of geography and semantics in lexical borrowing. *Journal of Linguistic Geography* 7(1), 14-32.
- Johanson, L. 2002.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a code-copying framework. In M. C. Jones, E. Esch(eds.) *Language Change*.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285-313.
- Klöter, H. 2011. *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 Lim, H. S. 1886. *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 Koh Yew Hean Press.
- MacGowan, J. 1869.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HongKong: De Souza & Co.
- Norman, J.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quest, P. 2007. *A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roto-Hla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 Schlegel, G. 1890.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Deel IV)*. Leiden: Brill.
- Swadesh, M. 1971. *The origi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Tadmor, U. 2009. Loanword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Findings and results. In M. Haspelmath, U. Tadmor(eds.) *Loanword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55-75.
- Trudgill, P. 2011. *Sociolinguistic typology: Social determinants of linguistic complex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Loon, P. 1967.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Part 2). *Asia Major* 13, 95-186.
- Weinreich, U.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Winford, 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 Yue-Hashimoto, A. O. 1985.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A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Hong Kong: Ng Tor-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Zeng, X. 2018. A case study of dialect contact of early Mandarin. *Lingua* 208, 31-43.



## Southern Min Words for “Flesh”: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ZENG Zhic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words for “flesh” in Southern Min (embracing Puxian, Quanzhang, Datian, Chaoshan, Leizhou, and Qiongwen in a broader sense) is displayed, and changes are implicit by examin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semantic and 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early separated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脈” (e.g., [baʔ<sup>7</sup>]), “肉 h-”, and “肉 n-” are original forms in Zhangzhou, Quanzhou, and Puxian, respectively. Since the Qing Dynasty, Quanzhou has undergone the geographical diffusion of “脈”, and Chaoshan has lost “脈” in favor of “肉 n-”. Major dialects, such as Taiwanese, Leizhou, and Qiongwen, generally underwent leveling, whereas some minor dialects retained the inherited variants or gained variants through borrowing. Furthermore, the cases and processes of intra-syllabic contamination are covered.